



以青铜重器勾连起历史和现实

刘醒龙十年磨一剑推出长篇力作《听漏》

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韩晓玲 通讯员 杜子薇

从曾侯乙尊盘写到九鼎七簋

神来之笔。”刘醒龙说。

于是在作家笔下，徐徐铺开了一段跌宕起伏的故事，历史悬念与现实谜团相交织：20世纪60年代出土的青铜重器九鼎七簋，因为缺一簋而成为考古界的热门课题。楚学院的专家学者、民间考古爱好者、听漏工、盗墓贼等各路人物纷纷登场，各显身手，试图揭开这一千古之谜。随着这一谜底的渐渐揭开，一段刻骨铭心的往昔情感、现今几位人物的传奇神秘身世，以及曾随两国为何为一家历史悬案，展现在读者眼前，历史与当下、世情与人生的真实而复杂的面相也一一呈现……

小说以半个世纪以来考古人的生活与命运为经，以青铜器九鼎七簋承载的历史和现实意义为纬，将个人命运、城乡变迁与文化传承、历史演变结合起来，通过对礼器制度的追溯探讨了历史变迁中的人心与伦理，通过对考古人精神世界的揭示追问了当代知识分子的责任和担当。

既写文物考古也写世相人心

旧般将一些鲜活的人和事发生地，设置在曾行驶在武汉三镇最繁华路段、现已成为追忆的64路双层公交车。关于京山的描写也惟妙惟肖，比如外地人很少知道的喝早酒的习俗等。

小说着眼于文物考古，富有文化味道；小说写的也是世相人心，弥漫着烟火气息。

为何用“听漏”二字作为书名？刘醒龙解释说，首先是其音韵的魅力，当然还有它蕴含的神秘与神奇。

这部小说里，听漏工出场不多，话语很少，却绝技在身，成为书中一个关键人物，串联起一众人物和故事情节。

文学更多时候是细水长流

刘醒龙说，一颗种子需要埋在沃土里，等待时机生根发芽，经过春夏秋冬季节的考验，才能开花结果。写作亦如此。“灵感要放在心里一点点焐热，经过漫长的时光滋养，方可有所收获。”

在《听漏》创作过程中，不少人物都超出原来的设计，“走”出一条属于他们自己的人生之路。在刘醒龙看来，写作就是这样，种子一旦开始发芽，就会自己生长。《听漏》中铺垫了足够的沃土，供给他们独立自由地生长。

考古圈的那些事儿

□ 林颐

的故事，还有他们不一样的选择。所有故事的主干，皆与楚地考古研究相关。

小说的开端，作者运用黑色幽默的喜剧笔调，描述了楚学院各办公室独具趣味的命名：楚馆秦楼、楚因对泣、楚才晋用、楚云湘雨、四面楚歌……看似风趣的这些命名背后，其实暗藏玄机，喻示着楚学院长久以来的工作秩序中微妙的人事运作。随后，两周（西周和东周）时期的一座大墓出土，小说就此揭开序幕。

楚学院是因应一九六六年在秋家垄发现九鼎七簋而成立的，可是，这么多年来，考古界竟然不知其下还藏着一座大墓，反而被盗墓贼捷足先登。由此，引出了考古的各种牵制、一些禁忌，以及楚学院复杂的人事纠葛等小说背景设定。

主人公马跃之，研究古丝绸兼漆器等杂项的学者，在研究青铜器扬名于世

的楚学院，他就像庶出，而曾本之率领的团队才是嫡系。这一次，这个“庶子”却要担负起这项考古重任。

曾本之为何在这个时期选择退休？是谁给马跃之投递了一封用甲骨文撰写的“马上告之”的神秘信件？马跃之为什么多年远离青铜器学术，刻意隐藏自己的才能？小玉老师的临终遗言“知知者之，不知者之”，到底是何用意？那对龙凤胎流落何处，被何人收养？九鼎七簋，是一种奇怪的形制排序，那么，有没有第八簋的存在？…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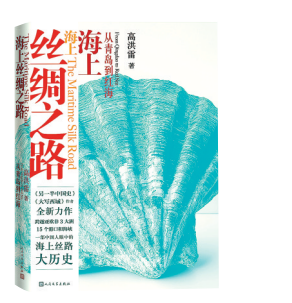
谜团接踵而至，如线团一般缠绕，渐渐清晰，指向20世纪60年代乃至更早前以前的墓葬、文物收藏和鉴定等事宜，牵涉家族秘闻。这些故事所纠结的，不外乎世道人心、名利爱念，求之不得，舍之可惜。上一辈，他们有过巨测心机，

国庆长假读好书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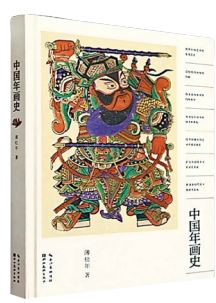
《治家：中国人的家教和家风》
李存山 主编 广西人民出版社

本书选取在家教家风方面有代表性的二十位先贤，讲述他们的家教和家风故事，突出优良家教家风的形成、传承以及对人格精神的涵养，展现了中华家风文化润物无声的力量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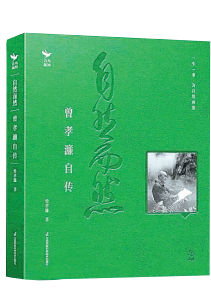
《海上丝绸之路：从青岛到红海》
高洪雷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

本书选取亚欧非三大洲的15个港口、海峡或海域，串联起一系列中外海上贸易和文化交流的故事，突显了海上丝绸之路在东西方交往过程中的重要作用，展现了“一带一路”倡议深厚的历史渊源和文明积淀。



《中国年画史》
薄松年 著 湖北美术出版社

本书系统梳理了中国年画从起源到现代的发展历程，清晰展示了年画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演变和特点，深入探究了年画的艺术形式，以及与民俗文化的关系，彰显了中国民间美术独特的艺术魅力和价值。



《自然·自然：曾孝谦自传》
曾孝谦 著 江苏凤凰科学技术出版社

本书是植物科学家曾孝谦先生的自传，记述了他在科学学、博物学、邮票设计及彩墨生态绘画等领域的探索历程与人生感悟，展现了一名植物科学家徜徉于科学与艺术之间，精益求精地为自然画像的治学精神。

走近与苏轼心照神交的张岱

□ 赵莹

明史专家吴晗先生曾在文章《晚明仕宦阶级的生活》中提及，“晚明仕宦阶级的生活，除了少数的例外（如刘宗周之清修刻苦，黄道周之笃学正身），可以用‘骄奢淫逸’四字尽之。”此时，稳定的政局，闲逸的生活，使得晚明文化飞速发展。纵观当时文人的生活轨迹，不难发现，“玩”是当时盛行的生活方式，而张岱正是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人物之一。

张岱是明清之际的文化奇才，不仅著作等身，还对散文、收藏、天文、历法、经学等深有研究。正因如此，后世的文人名士对其推崇备至，对其所作文字，更是大加赞赏。作者老桥在新著《湖山：张岱与他的美学世界》中，从行旅、美食、戏曲、交友等九个维度，叙述并追忆了张岱的日常生活，并将心中体悟融于其间，积攒成集知识、情节、趣味兼备的智性之书。

众所周知，张岱出身名门望族，自小锦衣玉食。丰厚的物质生活滋养着他广泛的兴趣和才艺，也培育着他敏锐的审美志趣。老桥把张岱的文化素养归因于张家家风的承袭。他认为，“张岱家学渊源，从他的祖父到父亲，再到他这一辈，都是玩出来的生活美学家”。张岱三代爱戏，办家班，教新伶，耗费财力大搭戏台、船楼。因此，张岱赏戏，懂戏，创作、谱曲、布景等都不在话下；张岱祖父张汝霖重饮食，曾与朋友合著《蟹史》，对不同地域的食物加以注解，使张岱对饮饕拥有广博见闻；张岱三叔张炳芳嗜茶，善品茶，还与张岱合作，自制兰雪茶名满当地。张岱对茶的爱延续一生，不光遍寻各地好茶，而且把对茶的认识带进人物、故事和环境之中，让人读来耳目一新。

张岱钟爱之事极多，列举不尽。老桥选取的部分，恰是最具代表性的。里面有玩到极致的风雅爱好，有懂得生活的艺术追求，更有寄托精神的家族传承。这是张岱美学观念的起始，也是他日后人生抉择的内因。

张岱曾说过“人无癖不可与交，以其无深情也；人无疵不可与交，以其无真气也。”张岱的择友观很朴实，所结挚友，个性万千，趣味相投即可。比如张岱和闵老子以茶交友，互相试探品茶鉴赏的能力，最终被对方折服，成为莫逆之交。这平淡的茶友会面，蕴含令人心醉的茶道风范；再如张岱常去鲁云谷家做客，赏花品茗，畅谈诗文，共赴美好雅集。这些幽雅的诗韵，涌动着对自然造化的柔情，堆叠出异常丰富的语言形式。无怪乎张岱笔下文章精练深情，自有清高脱俗的意味。

不过，真正决定张岱作品性格的，是他个人乃至时代遭逢的剧变。前半生，他鲜衣怒马，纸醉金迷；后半生，他饥寒落魄，形如野人。

清兵入关那年，明朝倾覆，退出了历史舞台。张岱一朝沦为遗民，只能隐居深山，靠残羹冷炙了此残生。没承想，在极端窘迫的日子里，张岱反倒安贫乐道，享受起寂寞清苦的日子。最令人惊叹的是，他不断写书立著，留下《西湖梦寻》《陶庵梦忆》等大作，还用八年时间完成《明史》的写作，终成一代巨匠。书中并未过多描述苦难，而将重点放在张岱的立世之态。张岱的品格，初衷源于对陶渊明风雅的追慕。此后江山易主，在生死是非间又将渊明作为人格支撑，以消心中惆怅。

研读张岱的美学思想后，老桥比对其他文人的相关记述，发现张岱和苏轼的诗文有惊人的相似。两人早已心照神交，精神风骨极为贴近。老桥将其归结为三点：“第一，东坡和张岱都喜欢陶渊明，两人都曾经写过《和陶集》，陶渊明的隐士思想对曾经有过重大磨难的两人来说，影响都很深刻，尽管生活窘迫，依然向往精神的自由与愉悦。第二，东坡与张岱都对生活保持乐观的态度。越是艰难之时，越能体现出其性格的顽强，对时事的豁达，对人事的宽容；第三，东坡与张岱都对所爱之事保持浓厚兴趣和高度专注。”正因这超然物外的心态，钟情自然的情怀，表现真我的文风，他们能在风雨飘摇中，坚守气节，呈现出寓意于物的旨趣，最终在学问、文章等方面达到一个光辉的顶点。

影响张岱的，何止东坡一人，徐渭、袁宏道、王守仁等人都是。他们将儒家“志存天下”的意识和道家乐观旷达的志向相融，构成自己的处世之道。他们的生活美学一脉相承，延续至今。

永不枯竭的是我的心跳

——聂鲁达其人其诗

□ 任文

智利诗人巴勃罗·聂鲁达是中国读者熟悉的，不久前，人民文学出版社最新出版的《聂鲁达诗选》上市。这部诗选收录聂鲁达21本诗集中的156首诗，由北京大学西语系教授、资深翻译家赵振江亲自编选并精心打磨译本，是国内迄今为止篇幅涵盖最完整的一部聂鲁达诗选。

在“永不枯竭的是我的心跳——聂鲁达其人其诗”活动现场，赵振江表示，几乎有一半的篇目都是首次译出。“我选择的都是他各个时期的代表作，偏重于1936年以后的作品。因为在这之前他非常困惑，写的也都是超现实主义色彩更浓厚的内容，有时候你不知道他要说什么，我想他自己大概也是很迷茫、很困惑。比如《大地上的居所》，它一共有三部分，第一和第二部分都是他在亚洲当外交官时写的，那时候他非常孤独和迷茫。从第三部分开始，其中的核心部分就是《西班牙在心中》，他的诗歌风格发生了转变，实际也是他的人生道路发生了转变。”

中国作家协会诗歌委员会主任、诗人吉狄马加坦言，自己所读的第一本聂鲁达译本便是袁水拍翻译的《聂鲁达诗文集》，最让他感到震撼的篇目则是《漫歌》中的《伐木者醒来》：“我觉得一个诗人在反映20世纪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，如争取民族解放、人民自由、国家独立等大的历史变革的时候，左翼诗人承担着很重要的角色，他们不仅仅是通过诗歌来表达个人的生命经验，更重要的是要完成一种崇高的事业。这些诗人写的作品肯定不是个人的一些太琐碎的东西，他们所写的和这个时代、个人的命运包括人民的命运，都是紧密联系在一起。”赵振江也回忆了20世纪50年代北京大学中文系学生晨起朗诵《伐木者醒来》的情景，可见聂鲁达对中国诗歌界，尤其是对青年诗人的影响之大。

聂鲁达代表作《漫歌》中描绘的马丘比丘遗址，是位于秘鲁的一座城堡，当年聂鲁达曾骑马前去探访。赵振江认为，“《漫歌》实际上是整个智利甚至是拉丁美洲的一部当代史诗，从哥伦布发现美洲之前写起，从拉美的河流、矿藏、鸟儿，写到拉美的征服者、殖民者、解放者，然后写到各阶层的人民，写到矿工、渔夫、农民，一直写到他自己成长的经历，以及各国保卫和平、反对战争的革命。那些超一流的大诗人，像帕斯写《太阳石》，巴列霍写《人类的诗篇》，不管是现实主义的，还是超现实主义的，基本上都是站在人类的高度，反映的是人性。”